

蒋孔阳濮之珍伉俪都是我的老师,他们年轻时,一位教《文学引论》,一位教《语言学引论》,系主任朱东润先生将他们家戏称为“双引楼”。朱老是书法家,可惜蒋、濮二位没有乘机要他题写“双引楼”匾额,否则倒也是一件珍贵的艺术品。

不过,我们1953级的《语言学引论》还是吴文祺先生讲授,要到下一个班级濮先生才开始接任此课。她给我们班上的是写作课。那时濮先生还打着两条小辫子,走起路来辫子左右跳动,很有青春的活力。濮先生讲话非常清晰,也要求我们作文明白晓畅。那时我们都是文青,写作常带文艺腔,追求文笔之美,但濮先生说,写文章要把意思表达清楚,不要写得花里胡哨,这使我受益匪浅。

毕业后我留校任教,长期与蒋孔阳先生同处于文艺理论教研室,还做过蒋先生《文学概论》课(《引论》课后来通称《概论》课)的辅导教师。这样,我与蒋、濮二先生的关系就更

雅俗共赏话荠菜

万伯翱

荠菜,大多数读者都不陌生。田埂麦垄和广袤的田野上,这种白花绿叶的十字花科荠草本植物星罗点点。在穷苦的岁月里,它可以充饥;今天它又可以调节生活,让人一饱口福。

我祖籍是山东东平县,爷爷奶奶这辈家道中落,爷爷逃荒到山西当兵打鬼子英勇牺牲,剩下奶奶和父亲两人孤儿寡母成为县镇贫穷人家。每年仲春时节,奶奶就带领着孩子们到野外去挖荠草、摘树叶、寻觅荠菜和各种能吃的野菜,加上杂粮薯片当主食用。青黄不接的时期,齐鲁大地东平湖畔,穷人们个个臂挽小篮,手执小镰刀在湖畔野外散开。阳光明媚下,野地里荠菜刚破土不久,丛生出来呈层层叠叠莲座状,小叶

不很绿,株株灰头土脸,有时还不好一眼发现。回家抖去尘土和去年枯黄的旧叶,开水焯一下,拌上杂粮少盐无油,孩子们就狼吞虎咽果腹了。那时候就是穷人上好的主食了。至于现在大家最常吃的荠菜加上猪肉、白面为皮的馅饼、水饺、馄饨,在旧社会因很难见到肉和白面的穷人家里,那可是珍馐美饌。

随着战争的结束,我们全家搬到北京,春天时祖母和妈妈一直以荠菜水饺待客。在60年代风暴中有大字报揭发我父亲“以水饺拉拢‘x霸’时传祥、‘工贼’张百发等”,说的就是我祖母和母亲亲手包的荠菜猪肉馅儿水饺。北方人吃水饺一般不炒热菜,不煲汤,都喝煮饺子的面汤,再配上三四个凉菜下酒招待客人足矣。

如今,荠菜已由野外生存的小众人工种植后,可全年供应大众食客了,一年四季上海、北京等地群众尽可享用,这种生长周期较短的小叶绿色荠菜用来包馄饨、水饺和锅贴以及菜合子等,总是大受食客欢迎。

中国美食在世界享有盛誉,历史上许多大文豪不少也是大吃货,如大文豪苏东坡和大诗家陆游翁等都异口同唱荠菜诗篇,其中苏轼美食散文流传于后世曰:“今日食荠极美……虽不甘于五味,而有味外之美……其法,取荠一二升许,净择,入淘了米三合,冷水三升,生姜不去皮,捶两指大,同人釜中,……不得入盐醋。君若知此味,则陆海八珍,皆可鄙厌也”。

大家可以试试文豪的烹调配方如何?

密切了。不过促使我与他们走得更近的,还是参加“四清”运动的经历。我参加过一期小四清,两期大四清。大四清的时间很长,第一期搞了半年多,第二期则将近一年。第一期在奉贤县胡桥公社,与濮先生在一起;第二期在宝

山县罗店公社,与蒋先生在一起。奉贤离复旦较远,那时交通不便,要走大半天时间才到。每月轮休时濮先生总约我一起走,说路上有个伴,可以说说话。在罗店搞四清时,我与蒋先生常在一起聊天,有时还结伴溜到镇上买东西吃。我们的师生友谊,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。

蒋先生身体不好,77岁就过世了,濮先生一个人居住,有点寂寞。她在美国教书的二女儿蒋红接她到美国去住,她不习惯在国外久居,住了几时就回来了;在复旦工作的三女儿蒋年要她搬过去同住,她也不肯,还是喜欢住

在老窝,过自己的生活,做自己的事。独居有独居的好处,但年纪大了,也有难处。有一次,濮先生跌倒骨伤,站不起来,恰巧钟点工阿姨又不在,家里没人,非常为难。好在她头脑清楚,赶快爬到厨房,先把炖着菜的煤气灶关掉,以免煤气泄漏起火,然后再爬出厨房呼救。真是临危不乱!后来,在上海大学工作的大外孙(大女儿蒋濮的儿子)每周来陪住两次,帮她做点事,陪她说说话,她很高兴。

濮先生生于1922年,到去年(2021年)已是虚龄百岁,复旦大学中文系和校统战部联合为她做百年大寿,也请我们这些老学生参加。濮先生自那次摔跤以后,就行走不便,这次是坐着轮椅来的,但头脑还很清楚,在致答辞时,讲得头头是道,我们一桌吃饭,她的食量也很好,真是令人高兴。过了几天,她忽然打电话给我,说想与我聊聊天。她的记忆力仍然很好,讲了许多往事,都很清楚,但毕竟年纪老了,也有记不清的时候。谈着谈着,她忽然问我:“小吴,你今年有60岁了吗?”我回应道:“濮先生,我们都85岁了!”她说:“啊!你都那么大了?那我不好再叫你小吴了,以后叫你老吴吧!”我忙说:“在老师面前,我永远是小吴!”她高兴地笑了。后来我转而一想,觉得也不奇怪,贾植芳先生晚年也老是我问我:“小吴,你60岁到了吧?”那时,我已70多岁了。而我那些早期学生,现在也有七八十岁了,我仍觉得他们还小,把他们当年轻人看待。这大概是



渔村吊桥

水彩画 荣德芳

居家也能植树造林?这原本是天方夜谭,在我家成了现实。

今年搬入新居,有了近百平方米的顶楼大露台,不仅可以种花,还能能植树了。露台东侧的两个直径和高均达一米的缸首先被考虑用来植“大树”;而其他按照缸直径的大小以及立式仰或卧式的盆缸,则按照树(花)种生长的需求,让它们各得其所。

城市里哪里才能买到树种呢?网上搜索,将我指引到一个兼卖树种的农贸市场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,我买下了杨梅树、桃树、玉树、橘树、金橘树、葡萄树、枫树、雀梅等。由于树根都裹着厚厚的原泥,所以只能雇了一辆农用小车运回家。为了提高树种的成活率,我不仅拜能人为师讨教经验,还用上了手机软件“识花君”。我对着树种拍照,了解不

壬寅年三月,春暖,梅花开尽,山茶、樱花、玉兰、海棠、丁香次第。在等待“草色青青柳色黄,桃花历乱李花香”之际,忽有疾风起,春失色。

面对严峻形势,迎接病毒挑战,家所在的小区和工作的医院也连续被通知48小时封控和召回核酸检测。星夜凌晨被召回医院。

灯火通明的院外核酸检测点,四处赶来的人们还排着长队,志愿者和警察在维持着秩序。4小时后,医院官方推送了暂停门急诊服务和核酸检测服务的通知:“根据国家疫情防控要求,我院严格落实相关人员及环境筛查措施”,医院开始闭环管理。

按照医院部署,乳腺外科紧锣密鼓地安排当日门诊停诊和住院病房工作,第一时间安抚住院患者和通知当日已预约就诊的病人改期。在工作中接到医院门卫电话,告知有我们的患者在西门口有事求助。

从住院楼去到西门,一门之隔,见到已手术回家一周的乳腺癌患者沈芝(化名),她告知说:“今天已预约来门诊伤口换药和拔引流管,两根引流管脱落了一根,引流液也很少,另一根管口处疼痛难忍,所以儿子早早就把我送到了医院等开诊,没想到医院门诊楼关着。”沈芝焦虑

做教师者的普遍心理,不一定是记忆力的关系。

今年春节后,我去看望濮先生,她很高兴,与我谈了很多,说复旦给她了做百岁大寿之后,市农工民主党又给她做了一次,“在座谈会上,他们要我介绍养生经验:如何锻炼?吃什么补品?是否如实回答:既不锻炼,也不吃补品,要说养生,就是两条经验:一是能吃,二是能睡。我每顿吃一碗饭,一碗菜,饭是普通米饭,菜也是一般小菜,荤素搭配。以前我是一觉睡到天亮,现在年老了,要起夜,但起过之后,马上能睡得着。别的什么讲究也没有。”我觉得这倒是很好的养老经验,值得学习。不过,根据她的实际生活情况,我为她补充总结出第三条经验,就是精神上有所寄托,老来有事做。濮先生之所以要独立居住,除了要有自己的生活空间,要保持自己的生活习惯之外,她还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这就是精神上的寄托。蒋先生过世,濮先生非常悲痛,经过一段时期的精神调整,她就坐



等她死后再出。同时,她又为自己再版了《中国语言学史》,編集出版了《濮之珍语言学论文集》,最近,她又在电话中告诉我,她在四川江津国立女子师范学院读书时做的毕业论文《扬雄方言研究》,有五万字,也要出版了。这些书的出版,虽有年轻人的帮忙,但总要濮先生的整理、审阅、定稿。估算一下,濮先生在这20多年间,所做的案头工作真也不少。

从濮先生的经验看,老年人做一点自己喜爱、力所能及的工作,在精神上有所追求,有所寄托,似乎比为养老而养老更能养老。

春光,如你们

汪洁

而不安,她老伴也在一边求助。

“你儿子在哪?”我问。“儿子是警察,他要上班,所以已经离开了。”沈芝的老伴很无奈。“别着急,打电话给他,让他来接你们,可以去其他没有闭环的医院处理伤口。”

做警察的儿子急于去单位工作,驾车将沈芝和老伴送到了西门口便匆匆而去。沈芝不愿离开,请求帮她处理;打他儿子电话说工作放不开,拒绝来接。我边安慰她边跟团队商量如何解决。想到向医务科申请,给个处理意见;也想到联络兄弟医院相关专业医生,并叫车送去换药拔管;最后,是想到可联系到未封控的志愿者医生上门换药。我问沈芝要了联系电话和地址,答应她会安排医生上门去换药,让她和老伴回家去等,并快速找到了就近的两名志愿者小魏和小顾的微信,与她们讲明情况,她们说即刻赶来医院,拿换药包和一些换药辅料。沈芝老伴表示感谢后,领了她先回家了。

昔日五角场的翔殷路邮局,虽算不上文化地标,却也是五角场居民经常光顾、寄托情思的地方。尤其像我一样远离故乡的军人,对邮局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,总是感觉邮局是距离故乡、亲人最近的地方。

翔殷路邮局位于从前翔鹰电影院东侧,如今的合生汇商业广场中心区。当时从环岛东行不到百米,就见一个美丽雅致的小花园,园内树影婆娑、鸟语花香,这是1985年建成的“翔殷花带”的起点。从花园边一条小路进入,便是邮局所在。门口是一个报刊门市部,销售报纸和杂志。每当走近门口,总有一股清新的油墨香扑面而来。宽敞的营业大厅有一长溜窗口和长途电话间,里面还有一幢五层综合大楼。这样的排场,在当时的邮政系统可是有相当的规模了。五角场大学多、驻军多,大学生、教授、官兵都是主要顾客,大厅里常常人头攒动。90年代初我在空军政治学院读书的两年,成了这里的常客。那时我经常给报刊投寄稿件,将退稿的信封翻过来糊成大信封,用剪刀剪去一个角,再在信封右上角写“稿件”二字,直接塞进邮局的大邮筒。

1991年7月初,我收到《青年报》社寄来一份发表我的散文《故乡的航船》的报纸,那份报纸被队领导要去张贴在俱乐部的墙报栏。我趁午间休息,冒着小雨赶去邮局买几份留存。到了报刊门市部一问,《青年报》已售罄。卖报刊的是一位30多岁的瘦高男青年,他幽默地指着旁边正在翻看杂志的姑娘说:“喏,都给她买走了。”我问那姑娘:“你买了多少份呀?”我以为她是做报刊生意的。谁知她回答:“你听他瞎说,我也就买了一份。”卖报刊的青年接口说:“那不就是吗,本来就剩这么一份,你买走不就全部买光了吗?”我听完惋惜地叹了口气。他们说:“你买其他报纸不也一样吗?”我告诉他们:“不一样啊,上面有我发表的一篇文章。”那姑娘一听,赶紧从小包里取出折叠好的报纸,问:“哪一篇?”我伸手指给她看。她露出欣喜的目光,望了我一眼,然后退到一边浏览起来。这时我才仔细端详那姑娘,她身材娇小,穿一套黄色连衣裙。她看完后对我说:“你的文章写得真不错,也太巧了,我把报纸让给你吧!”后来我买了本最新的《大众电影》送给她,临走我问她是哪儿的,她告诉我她是上海财经学院的学生。如今一晃过去三十年,回忆起来还是心甘如饴。

当时信件邮戳上,还盖着“宝山”字样。据说五角场几经变迁,最终划归杨浦,但这家邮局仍然属于宝山邮政管辖。2001年前后,邮局推出一项为企业业定制明信片的新业务。有一位我所在部队的军嫂刚被安置到这家家邮局上班,我当时在负责教学保障,考虑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军校学员,对优美的教学场馆需要做一些宣传,同时也支持一下这位军嫂的工作,经请示上级,同意定制一批明信片。于是我们请来专业摄影师,在校园拍摄了一组高清照片,挑选其中10张,制成一套精美明信片,放在教学区文具室出售。没料到深受学员们的欢迎,尤其是新入学的本科生。

随着建设的推进,邮局被异地置换到僻静狭小的政本路上,翔殷路邮局于2011年6月22日悄悄落下帷幕,改称“张北路邮局”,次年3月从宝山邮政系统剥离,纳入杨浦邮政。“植此往矣,今念一夕”,总有一些事物属于远去的那个年代,在一代人心中永存。

翔殷路邮局往事

周建新